

施莱格爾的浪漫主义文学 主张与浪漫主义莎评

李伟民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编辑部,重庆市,沙坪坝400031)

摘要:弗·施莱格爾的浪漫主义莎评在世界莎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在浪漫主义文学主张中将莎士比亚戏剧视为浪漫主义的杰作。他对莎剧艺术成就的认识是世界莎学宝库中的不朽遗产,对我们认识莎剧的艺术价值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弗·施莱格爾;莎士比亚;浪漫主义

中图分类号:I516.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5)02-0079-07

在德国浪漫主义运动中,施莱格爾(Shlegel, 1772—1829)是举足轻重的人物。施莱格爾是德国早期浪漫派的理论家、纲领制定者和精神领袖,他以浪漫主义理论影响了整整一代德国早期浪漫派作家的文学创作,其文学创作的原则集中体现了这一批人的文学主张、思想和要求。他不但在文学批评、美学研究方面对浪漫主义运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在莎士比亚研究、评论方面也为后来的莎学研究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他在莎学研究中把浪漫主义文学主张贯穿于莎士比亚研究中,以他的独特视角,即带有明显的浪漫主义精神的风格,试图以浪漫主义主张解构莎士比亚,并认为“莎士比亚的浪漫深刻、严肃而且宏伟,是最充实、完备意义上的浪漫,应该作为浪漫主义文学创作的楷模”[1](420页)。他对莎士比亚的倾情赞颂已经为19世纪和20世纪世界莎学界所熟知。但是,与这种熟知相反,对他的莎学

思想却梳理和研究得极为不够。因此,我们有必要从美学和文艺批评的角度对他的莎学思想加以梳理,研究他的浪漫主义文学主张和浪漫派莎评之间的关系,研究他在浪漫主义思想指导下所形成的对莎士比亚的独特看法。我们知道,他在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下对莎士比亚戏剧进行的深入研究已经被视为莎学研究中的经典理论,但我们对这种理论在美学和文学批评上的意义还不够清楚。因此,弄清他的观点,将有助于我们对浪漫主义莎评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更全面地认识莎士比亚戏剧艺术的永久魅力和不朽价值。

一 以莎作的时代精神作为浪漫主义的旗帜

浪漫主义是欧洲感知史和趣味史上的重大颠覆运动之一^①。施莱格爾与整个浪漫主义思潮相呼应,因而在莎学研究中树起了浪漫主义的旗帜,并且与英国和法国的浪漫主义莎评遥相呼应,构成了欧

收稿日期:2004-08-1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五规划项目“比较文学史”子课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中心重点课题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01EZW001;OUAZID. 11—44001。

作者简介:李伟民(1955—),男,四川成都人,四川外语学院学报副主编、副教授,中国莎士比亚学会理事,主要从事莎士比亚研究、比较文学研究。

洲大陆声势浩大的浪漫主义莎评,从而颠覆了古典主义覆在莎士比亚身上的尘垢,给欧洲大陆对莎士比亚的评价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春风。与前辈文学批评家对莎士比亚的看法不同,浪漫派及其施莱格尔竭力推崇莎士比亚并非偶然,因为,在莎士比亚戏剧中所表现出来的精力旺盛、狂放雄浑、豪侠自由的精神和“细节真实的世界画幅”[2](344页)正是浪漫派在他们的文学艺术创作中和精神上所梦寐以求的和他们用来对抗古典主义的强有力的武器。

施莱格尔认为,浪漫主义的文艺是一种前进的综合艺术,他的使命之一就是要一切划分开来的种类又联合起来,这种联合当然既包括浪漫精神与莎士比亚,也包括文艺、哲学和辩论术。他坚定不移地表示莎士比亚“是浪漫主义的代表”[3](583页),尤其是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和喜剧更符合浪漫主义的要求”[4](398页)。这种综合艺术应该把诗和散文、创作和批评、艺术的诗和天然的诗结合起来。而这种综合的艺术在莎士比亚的剧作中恰恰具有绝佳的表现,无论是哲学还是论辩术,无论是诗还是散文,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也无论是人为的还是自然的,“莎士比亚不受约束,有洞察力和多样化的特点”[5](846页)。也正是浪漫主义文学极力要追求的和达到的主要艺术效果,这样一来,我们会发现“浪漫主义在莎剧里都能寻找到相同的东西”[6](318页)。这种东西不是别的,而是浪漫主义理论的一块重要的奠基石。他认为浪漫主义的诗永远是在演变之中,就像莎士比亚戏剧一样充满了活力。浪漫主义往往把历史看作是一个民族对自己过去的一种自我意识的表现,而文学则是一个民族精神生活的体现[7](27页)。所以,莎士比亚在反映文学艺术创作的普遍规律的基础上,当之无愧地体现了民族精神,并与浪漫主义文学主张相契合,并且成为浪漫主义的一面鲜艳的旗帜。

施莱格尔所代表的浪漫主义莎评毫不留情地剥掉了古典主义加在莎士比亚身上的非难之词。当然,古典派攻击莎士比亚语言过分夸饰俗气也并非没有道理,但是到了施莱格尔和其他浪漫派那里,这些缺陷统统变成了优点,可以全都视而不见。他把莎士比亚所达到的艺术高峰作为自己不朽的楷模和永远需要模仿的范本,研究这个艺术世界造物主——莎士比亚开创的一片独特精神领域,因而成为浪漫主义文学家和理论家包括施莱格尔的一项重

要使命。施莱格尔的文艺批评促进了德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推动了德国浪漫派对莎士比亚的评论和研究。受其影响,他的哥哥在翻译了莎士比亚的17部戏剧的基础上,也在浪漫主义的旗帜下对莎士比亚戏剧进行了深入研究。兄弟俩共同努力将“莎剧”提高到和“诗”一样的地位,因为在他们看来,它们都是自由奔放、富有想像力和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早期浪漫主义的世界观和美学观。施莱格尔以莎士比亚的作品为浪漫主义的领路人,全面清算了古典主义对莎士比亚的狭隘认识,虽然在主观上是为了宣扬浪漫主义文学主张,但是在客观上却将莎士比亚研究和评论提高到一个新的理论水平,为世界莎学宝库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

施莱格尔把莎士比亚看作是浪漫主义的代表,是指引浪漫主义不断前进的一面鲜艳的理论旗帜。他认为和许多作家相比,莎士比亚不但掌握着时代和民族的精神,而且莎士比亚可以无愧地被公正地称为“人类心灵的大师”。在他眼里,世界必须浪漫化也应该浪漫化,浪漫化所导致的结果便是赋予普通的东西具有崇高的意义,给平凡披上一件神秘外衣,使熟知恢复未知的尊严,给有限以无限的地位,这就是浪漫性的特质。“莎士比亚的诗完全是浪漫性的”[8](320页),由莎士比亚代表的浪漫主义足以与法国的新古典主义相对抗。所以,他必须为浪漫主义寻找实践和理论的根据,莎氏作品就成了寻找这种实践和理论根据的最佳代表。他强调莎士比亚戏剧的浪漫性,并为莎氏深谙调动和激发观众感情的奥秘的能力所深深折服。他发现只要莎士比亚愿意,他就可以用充分的力量感染人的心灵,甚至在具有强烈现实主义针对性的莎士比亚戏剧中,他看到的仍然是莎剧中的浪漫主义倾向,他说,“这个伟大的诗人的意愿和禀赋,使他转向浪漫主义的方向”[8](320页)。这句话表明施莱格尔并非没有注意到莎士比亚戏剧的现实主义基础,而是更愿意将不朽的莎士比亚作为浪漫主义的领袖和同路人。而且他更进一步强调“他的浪漫是真正的,不片面的,不只是游戏性的,而且也是深刻、严肃和宏伟的,是最充实、完备意义上的浪漫”[8](321页)。他一扫法国新古典主义非难莎士比亚戏剧的讥讽,给19世纪的莎学研究领域带来了一股雄健、昂扬的狂风和甘霖。他认为这种浪漫性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的表现,最终是通过对人的复杂性的描写,这个诗人,无可比拟

地把人的心底隐事和盘托出,震动了我们的心灵,引起了人们的共鸣。借用钟嵘的《诗品》的话来说,就是:“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莎士比亚和浪漫主义清醒的理智下掩盖的狂放不羁的精神,力图掌握全部奇异复杂的人生、人性,洞悉人类心灵的奥秘,并能够最终揭开了人的情感的不确定性是毫无疑问的。

“浪漫主义并不是一种严谨、独特的美学理论,而是一种风行欧洲各国,渗透到文学、宗教、历史以及自然科学理论中较为完整的世界观。”[6](350页)但是不管这种美学理论如何自由,其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通过阐释莎士比亚戏剧的美学原则,为浪漫主义文学艺术主张寻找理论根据。唯其如此,它才显示出理论的魅力和蓬勃的生机,在不长的时间内横扫欧洲大陆。

施莱格尔成为德国浪漫派莎评的中坚并不是偶然的,与他一贯的浪漫主义文学主张是分不开的。他认为莎剧注重主观抒情和生动的想像,在要求想像解放的同时,经常采用夸张的手法,崇尚个性自由,尽情讴歌爱情与大自然。在这一点上与浪漫主义是不谋而合的。莎士比亚把从前人从外部世界寻找文学创作源泉转向从作家自身的内部世界去进行探索,因此施莱格尔的浪漫主义莎评也注意到莎剧强调天才的作用、感情的喷发和崇高感的获得,所以,他在莎士比亚戏剧中所获得的灵感用在浪漫主义的美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建设上。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莎士比亚戏剧所体现出来的浪漫主义精神与施莱格尔的浪漫主义文学主张如出一辙,并由此奠定了浪漫主义对莎士比亚的无条件的崇拜,也造就了他在浪漫主义莎评中的中坚地位。

施莱格尔追觅逝去的阳性诗风:“回忆过去,是因为经浪漫主义者美化的中古是一首田园牧歌,是浪漫派向往的社会状态和生活方式;面向未来,是因为未来会产生现在所没有的新事物、新精神,它们或许可以满足浪漫主义者的无限渴求。”[9](371-372页)这番话在卖力地甚至片面地抬高文学艺术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把莎士比亚推上了世界文学艺术的顶峰。施莱格尔曾经把历史学家叫做“朝后看的先知”,他轻视历史事实的非历史历史理论主义和单纯罗列历史事实的历史相对主义两个方面的弊害,试图将历史的客观事物作为以秩序发展的有机整体来把握,因为他对文艺复兴时期文学艺术的推崇,对

莎士比亚戏剧所反映出来的时代精神的追寻,所以反对他的文学、美学主张的人认为,朝后看这个称呼用在施莱格尔自己的身上最恰当不过了,但是,为了换取莎士比亚在创作和理论意义上对浪漫主义的支持,他也顾不了这么许多了。不管怎么说,浪漫主义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发现了一片新大陆。莎士比亚是十九世纪所向披靡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理论支柱之一,只有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他们才能寻找到这种浪漫主义精神和浪漫派存在的理由。

二 无限生命力和对美的探求是二者的契合点

施莱格尔的文学和美学批评曾对英国浪漫派莎评家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且与柯勒律治等人一起奠定了浪漫主义莎评在19世纪国际莎学界的地位。当然,作为浪漫主义文学派别的领军人物,他要用浪漫派的理论阐释莎士比亚作品,以便获得浪漫主义文学艺术、美学理论在19世纪思想界的通行证。

施莱格尔认为,艺术哲学常常“不是缺乏哲学,便是缺乏艺术”,而“任何艺术都应当成为科学,任何科学都应当成为艺术;诗和哲学应当统一起来”[6](352页)。为此,他首先着重论述了莎剧的浪漫性,认为莎士比亚的浪漫深刻,具有浪漫主义文学的显著特征,莎剧中蕴涵的浪漫精神应该作为后世浪漫主义文学创作的理论基石和仿效的楷模。他认为,这种浪漫的特征主要体现在莎士比亚的田园抒情风格和浪漫情调上。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莎剧就是浪漫的诗,而且,这种浪漫主义的诗是包罗万象的进步的诗。它的使命不仅在于把一切独特的诗的样式重新合并在一起,在审美的意义上使诗歌同哲学和雄辩术沟通起来。莎士比亚和浪漫主义的契合点就在于,它们都赋予了诗以生命力,赋予社会以精神,赋予生活和社会以诗的性质。在他们的创作中把生活变成了诗,达到了人生与诗的目的,并构成了艺术和科学的有机模式。在施莱格尔看来,莎士比亚和浪漫派都把“哲学诗化,把诗哲学化”[10](8页),在这个意义上莎士比亚和浪漫主义思想家都达到了最高目标。它力求而且应该把诗和散文、天才和批评、人为的诗和自然的诗时而掺杂起来,时而溶和起来。它应当赋予诗以生命力和社会精神,赋予生命和社会以诗的性质,同时也就是赋予莎剧以无限的生命力和对世界性质的“美”的反映。

再次,施莱格尔的莎学批评强调讨论对象的“个性”。在“发生学的解释中”中,对象得到详尽的探

讨,一直深入到最末梢的分枝,以揭示其盘根错节的意义关联。施莱格尔试图把诗、哲学、道德和宗教这四个人类文明的范畴,理解为人的创造性基本力量的表现,这几个范畴构成了我们的“精神世界”,即我们文化的帝国[11](70-71页)。而这一切都能够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找到渊源。过去我们在评析施莱格尔的浪漫主义文学主张时仅仅注意到他主张“普遍艺术”、“文艺主观性”,反对文艺与现实发生任何联系,而忽略了他在莎评中强调的莎剧是反映时代的镜子。但是我们在他对莎士比亚作品的解释中,却可以感受到他对现实主义也有自己的理解,即这种超越浪漫主义文学的特殊之处,与最后又回到浪漫主义起点的运动轨迹。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他在秉承浪漫主义文学艺术主观性的同时,并不是一味反对文学艺术与现实的联系。莎氏的悲剧、喜剧甚至历史剧都成为时代的镜子,施莱格尔从这面镜子中所呈现的浪漫精神中感悟到影响更广、更深刻、更真实和在更高层面上反映了时代精神的主流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因为“只有浪漫主义的诗像史诗那样能够成为整个周围世界的镜子,成为时代的反映”[6](318页)。无疑,莎士比亚作到了这一点,施莱格尔也了解和理解了这一点。

三 浪漫主义和莎士比亚的结合点

施莱格尔主要从浪漫主义立场批判了模仿说。通过对不同的文学体裁进行区分,从表现手段出发,他认为,诗歌等语言艺术因为所用的媒介的局限,无法直接塑造事物的外观,也不可能模仿什么。他懂得诗歌的局限所在,正是戏剧发挥特长的地方,所以,在这一点上怎么强调莎士比亚戏剧的浪漫性也不过分。他主张对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做如下修正:艺术必须塑造自然。退一步说把模仿与创造结合起来,不至于妨碍浪漫精神的表达,在这个意义上模仿说才是可以接受的。通过对莎剧的细致研究,他相当准确地指出,英国剧场只有他的奠基者和最伟大的大师莎士比亚才完全是浪漫的,从这一观点出发,莎士比亚和浪漫主义精神上的高度契合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浪漫主义在塑造自然的时候,必须把模仿与创作融合在一起,最终在能完全传达出狂放不羁的浪漫精神和莎士比亚戏剧所达到的完美的艺术效果。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浪漫精神却乐于混合不相干的事物;一切截然相反的东西——自然与艺术、诗歌与散文、严肃与欢乐、回忆

与预测、灵性与肉欲、现世与天国、生存与死亡,这一切都很自然地、被莎剧中突出的浪漫精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因为浪漫诗歌是一种被潜藏在宇宙深处的混沌神秘吸引着的表现,它不断争取以新异的惊人面貌诞生世间;原始爱所具有的灌注生气的精神在这里重新笼罩在茫茫的汪洋之上。这是具有无限生命力之所在,也正是浪漫主义文学艺术创作所苦苦寻找的。果不其然,他们在莎士比亚戏剧中找到了浪漫精神的理论根据。

在文学创作的来源上,施莱格尔也看到莎士比亚的作品反映了北方传说的主要成分,即“动荡其中的没有羁绊的大自然的精神”[8](316页)。这种神秘的“大自然的精神”只有运用并展开充分的想像力,才能够抓住这“幸运之神”,从而获得脱离了羁绊的“大自然的精神”——一种真正的浪漫主义精神。施莱格尔领悟到,莎士比亚故意使它们不受确定时空的限制。而这正也是浪漫主义文学所一贯主张的创作原则之一。莎士比亚对于性格和情欲、事件的发展和人类都具有浪漫精神主宰下获得的想像和幻想,以此作为追求美和自由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过程。在一些艺术和诗歌中,尤其在浪漫作品中,幻想应该被认作是一种受到自身法则支配的独立精神力量。施莱格尔则认为,创造就要依靠想像和幻想。想像和幻想也要从自然中拾取素材,然后加以改造重组。在这一点上,他既借此批驳了古典主义,又窥视到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的秘密。所以,他说,文学的功能不在于启蒙教育,不在于描写现实,文学应该写幻想而不是现实。作为一个浪漫主义的忠实领袖,施莱格尔在关键时刻,始终强调的是幻想和想像,而不是现实。这种想像和幻想是按照情感的逻辑反映莎士比亚时代的现实和美的真理。正如阿恩海姆所说:富于想像力的形象,并不是去歪曲真理,而是对真理的肯定。通过这种肯定想像和幻想,人们就不难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找到被西方历代视为最高的人生理想的目标——“自由”,以及文学创作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

弗·施莱格尔发现,通过浪漫的、自由的想像和幻想,原来的物质的形式已经从物质的束缚中被彻底解放出来了,艺术创造获得了空前的张力,莎剧中蕴涵的浪漫主义特质反而能够自由地刻画人的本质的东西。浪漫主义的文学主张恰恰在莎士比亚在戏剧中所创造出来的浪漫精神中找到了理论和实践的

依据。弗·施莱格尔所要力图证明的正是,被其顶礼膜拜的莎士比亚及其戏剧中的浪漫主义风格与浪漫主义的文学主张,无论是在实践上、精神上,还是在理论上都是契合的。美的形象,应当都是自由的形象,自由感是审美的最高境界。施莱格尔致力于创立一个“实践的和理论的审美科学的客观体系”,他要把美学从它深陷于其中的相对主义状况中解救出来。解救的方法之一就是利用浪漫主义和莎士比亚戏剧的非凡的想像力之间的比较,来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他认为通过比较,诗的历史必然自动走向一种诗艺术的客观的理论,而离开了想像似乎是难以完成的。他在深入分析莎作的基础上得出,莎氏的几乎每一个修饰语都可以用于装点现代诗,莎剧固然是“美”的,但仅仅有“美”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的实质,“美”还需要与非凡的想像力结合在一起,要实现这种结合,自由是必不可少的。而“所有这些特征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莎士比亚把浪漫的想像最鲜艳的花朵,哥特英雄时代最宏大的规模与现代社会最细微的特征、深刻而丰富的诗意哲学结合于一体”[11](40页)。弗·施莱格尔断言,“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把莎士比亚称作现代诗歌艺术的顶峰”[11](40页),但其中离开了想像力的作用则很难成功。其实,德谟克利特在《著作残篇》中就说:“一位诗人以热情并在神圣的灵感之下所作的一切诗句,当然是美的。”[12]热情和灵感都是浪漫主义者在他们的创作中竭力要追求的,在他们的理论中始终是大肆宣扬的,更是他们努力要在莎剧中发掘的。弗·施莱格尔相信,“美”由于脱离了生活和自然,掩盖了自然和人性中的种种丑恶,把大自然所赋予人类的美丑交织的生活、环境、情感仅仅过滤为一种单色的苍白的“纯美”,那么,这种失去了自然形态的“美”在他看来就已经不能称其为“美”了,因为这样的“纯美”既没有想像的参与,也失去了现实的根基,因而也就没有了蓬勃、旺盛的生命力。

施莱格尔提出美是那既迷人又崇高的东西。莎士比亚“让多产的大胆的幻想在自然的王国中翱翔,另一方面他又把自然导入超越现实界限的幻想领域”[13](303页)。他把这种幻想当作美的一个因素,是因为浪漫派最崇尚精神,而幻想的根源也正在于精神,包含着幻想的美才称得上是“真正的美”[9](375页)。他指出,莎士比亚“跟大自然一样,让美丑并

举,不分彼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反映了生活的真实。“人为的诗歌和大自然的诗歌要么不分彼此,要么就融合在一起”[14](303页),自然就等于生活本身,如果违背了生活本身,美也就不存在了。以施莱格尔为主的德国浪漫主义诗人和理论家解释到,在艺术作品中,材料(模仿媒介的自然)必须消融在(被模仿对象的)形式中,物质必须消融在意念中,现实必须消融在形象的显现中。莎士比亚戏剧所塑造的不朽形象和带来的美使我们想起自然的东西,因而也就是激起无限的生命充盈之感的東西。而且这种原生态的美本身就是“善”、“爱”和“道德”的表现。所以,施莱格尔提出,“莎士比亚戏剧中所蕴涵的浪漫精神正好说明,自然最高的美是永恒的并且总是植物性的,这也是同样适用于道德和爱”[9](374页)。他认为,纵观莎士比亚戏剧,没有一部戏剧的整篇内容自始至终是美的;从来也不是美的准则决定他全局的安排,而是浪漫精神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甚至莎士比亚“有时切开他的人物,好像用解剖的刀子在侮辱混乱的人生的腐烂难闻的道德尸体中掏挖着”[8](314页)。这种展示既是现实世界的生动反映,又是“浪漫文学的美学理想”[15]的必然体现。

同时,弗·施莱格尔重视把道德与美联系起来。在莎剧的大千世界里,他强调我们必须看到莎士比亚时代的社会风貌,即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和所谓虚饰的精神文化之间的根本区别,这才是莎士比亚戏剧真正的价值之所在。弗·施莱格尔所理解的莎士比亚戏剧的浪漫精神,是“跟人生和世界历史的深刻严肃意义结合起来”[8](320页)的,是“各式各样的形象如此鲜明”[8](320页)的人物,尽管表面看来它们是粗俗或浮华的,但他的浪漫却是“真正的”[8](321页),与同时代的英国其他剧作家比起来,莎士比亚走得并不算远。人们在莎剧中领悟到的是,“一个人是否有内在美,是否完善,其根基全在于是否有善心。这种善心温良敏感、善于体察,有这种善心才能显出高尚和宽厚的气质,显出深沉的美”[9](375页)。弗·施莱格尔认为,这种善心当然与道德和理性有关,他甚至认识到这种“善”在莎士比亚戏剧中有相当充分的表现。这种善在莎剧之中转化为感情的冲动和灵魂净化的爱和“道德”的具体呈现。“爱的精神”融入莎剧的浪漫性之中,成为“民族精神生活的体现”[16](922页)。虽然,在莎士比亚戏剧

中,从来没有用表面的所谓“美”和“崇高”掩盖宫廷里、生活中处处可见的粗野、血腥和情欲,从来不用虚假、苍白、伪善的“伟大”去掩饰赤裸裸的罪行和阴谋,但它本身却具有强大的道德力量和最完美的浪漫主义精神。道德和理性在莎剧中处于最深层,道德、理性表现为善心,善心呈现出美,因此人们才感到审美的愉悦。这才是莎士比亚戏剧对自然和生活的贡献,同时也是美的最生动的反映。美——道德——爱构成了莎士比亚反映生活的真实性,这种真实性是自然的最高法则。弗·施莱格尔在莎士比亚那里找到了共鸣。

同时,施莱格尔重视把道德与美联系起来。在莎剧的大千世界里,我们必须看到莎士比亚时代的社会风貌,即“真正的精神文明和所谓虚饰的精神文化之间的巨大区别”,这才是莎士比亚戏剧真正的价值之所在。施莱格尔深刻指出,“莎士比亚在无数场合,都特别着重反映当时社会的优美风习,而摈斥那些与当时社会风习相违悖的事物,不论它们是粗俗或浮华的”。比起同时代的英国其他剧作家来,“莎士比亚还算是规矩和道德的”。在他看来,一个人是否有内在美,是否完善,其根基全在于有否善心。这种善心温良敏感,善于体察,有这种善心才能显出高尚和宽厚的气质,显出深沉的美。善心当然与理性

有关,甚至认为“善”是崇高理性的诗。这种善可以转化为“感情冲动的源泉和灵魂是爱”。因此,“‘爱的精神’是浪漫诗的真谛,它必须隐隐现现地漂浮于浪漫诗之中”。莎士比亚“从来不用悦目的外表去遮盖粗野和血腥的情欲,从来不用虚伪伟大的外表去掩饰罪行和不义”,因为这样的处理方法是最完美的戏剧性格的塑造。理性处于最深层,理性表现为善心,善心表现为美。这才是莎士比亚戏剧对自然和生活的贡献,同时也是美的最生动的反映。美——道德——爱构成了莎士比亚反映生活的真实性,这种真实性是自然的最高法则。

施莱格尔作为德国浪漫主义运动旗手在莎士比亚评论方面的突出代表,将他所主张的浪漫主义原则应用于莎评中,而且在对莎氏的评论中融入了他的美学思想和文艺批评原则,对莎剧中的浪漫精神,莎剧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莎剧与生活的关系,莎剧的创作原则和莎剧的具体创作方法进行了探讨。而且,这种探索本身也是浪漫精神的体现,与古典主义莎评相比,浪漫主义莎评能够使我们从浪漫主义文学批评、美学原则的角度对莎士比亚有更全面的认识。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施莱格尔给后世留下的莎学瑰宝的永恒价值,以及他的历史局限性。

注释:

①这一点被〔法〕让·贝西埃、〔加〕伊库什纳、〔比〕罗莫尔捷等所认可,见他们撰写的《诗学史》,史忠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12页。

参考文献:

- [1]张泗洋,徐斌,张晓阳.莎士比亚引论:下[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
- [2]孙家琇.莎士比亚辞典[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
- [3]朱雯,张君川.莎士比亚辞典[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 [4]郑福同.希勒格尔是怎样翻译莎士比亚戏剧的[A].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莎士比亚研究:第4集[C].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
- [5]张泗洋.莎士比亚大辞典[Z].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 [6]蒋孔阳,李醒尘.十九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德国卷[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
- [7]李赋宁.欧洲文学史:第2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 [8]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 [9]曹俊峰,朱立元,张玉能.西方美学通史:第四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 [10]吴富恒.外国著名文学家评传:2[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
- [11]恩斯特·贝勒.弗·施莱格尔[M].李伯杰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

- [12]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一[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 [13]歌德. 莎剧解读[M]. 张可,元化译.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 [14]奥夫相尼科夫. 美学思想史[M]. 吴安迪译.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
- [15]冯亚琳. “浪漫的书”——论施莱格爾的小说理论与小说实验[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5).
- [16]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外国文学》编辑委员会. 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2[Z].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2.

Schlegel's Romanticism and Romantic Criticism of Shakespeare

LI Wei-min

(Editorial Office of the Journal of SIFL, Sichuan Institute of Foreign Languages, Chongqing, Chongqing 400031, China)

Abstract: German writer and romantic theoretician Friedrich von Schlegel is the most important romantic critic of William Shakespeare in literary history. He has deep influence on the early German Romantic Movement. He believes William Shakespeare is prominent as romanticist playwright. His thought and his critical theory shed light to the criticism of William Shakespeare's works.

Key words: Friedrich von Schlegel; William Shakespeare; romanticism

[责任编辑:张思武]